

第
二
十
八
輯

老照片

君子之交(上) 章诒和
悠悠岁月忆华工 张建国 张军勇
蔡锷丧仪写真 谢本书
张我军一家的两岸之旅 张光正
北大琐记 郭小聪
那爱德与上海“波尔照相馆” 王玉龙
我的六姑和海达 王达纬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

目 录

章诒和	君子之交（上）····· 1
	——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
	中国自古多名士。张伯驹以风流俊赏而处 社会丕变之中，临事为人愈见风骨……
张建国	张军勇 悠悠岁月忆华工····· 38
	“一战”华工的遭遇，也是中华民族特定 时代的缩影。一首《华工出洋歌》唱出了几多 豪迈，几多血泪……
谢本书	蔡锷丧仪写真····· 53
门晓琴	杨长征 一幅新发现的历史照片····· 62
王仁农	1949年：时代转换之际的影像····· 64
老 屋	皖风皖韵振风塔····· 69
张光正	张我军一家的两岸之旅····· 71
	一个世纪的风云激荡，一个家庭的悲欢离 合……
张光直	北京的生活····· 90
姜 瀛	红色政权任命的第一位省主席
	——姜济寰····· 99
潘乃谷	从一张少年时代的照片说起····· 105
郭小聪	北大琐记····· 110
	在转折的年代，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往往 折射着大时代的波澜……

三 三	星火战斗队	120
-----	-------	-----

王玉龙	那爱德与上海“波尔照相馆”	122
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

20世纪初,一位美国人在上海开设了一家颇具规模的照相馆,留住了行将消失的遗风流韵……

杜 菁	姥姥的一生	133
-----	-------	-----

韩秉公	未曾谋面的叔父	140
-----	---------	-----

李 菁	巧手母亲	143
-----	------	-----

张 威	童年的朋友	147
-----	-------	-----

嘉 蔚	袁世凯的总统制服	149
-----	----------	-----

王达纬	我的六姑和海达	151
-----	---------	-----

《老照片》丛书

主 编

刘瑞琳

执行主编

冯克力

执行编辑

张 杰

特邀编辑

丁 东

邵 建

美术编辑

蔡立国

技术编辑

张 涛

傅国涌	吕荧是一面镜子	154
-----	---------	-----

锐 明	“小骂”与“大帮忙”	155
-----	------------	-----

丁 东	破例的理由	158
-----	-------	-----

封二 西康省政府机关幼儿园的孩子们(孙明经) 中
插 宁波旧影(方霖) 封三 外祖父母的结婚照(杜菁)
最后的“川虎”(樊建川 142) 一张刘海粟签发的学生证(贾俊学 109)

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,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,须经本社同意。

·名人一瞬·

君子之交(上)

——张伯驹夫妇与我父母交往之叠影

章诒和



图① 20年代的张伯驹。

自打反右运动一起头儿，父亲（即章伯钧）就开始琢磨着反右的结局和自己的下场，甚至在上面还没想好怎么处理他的时候，他就在家里把自己处理了一回——让警卫秘书王锁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东客厅，请他们围着平时吃饭的圆形大餐桌，一一坐下。

父亲客气又郑重地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大概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了，我现在犯了政治错误。所以，请你们不要再叫我章部长了，可称我先生，也可直呼我的姓名。”

坐于一侧的王秘书赶紧声明：“在我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，大家都必须继续称呼您为章部长。”

此后，父亲不止一次地对家人说：“我们准备过老百姓的日子吧，回桐城老家更好。”

1958年1月底，父母双双获得“又划又戴、降职降薪”的处理。好像上边对父亲特别宽大，在撤掉交通部部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农工中央主席、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、光明日报社社长等九个职务之后，特意保留了“全国政协常委”、“民盟中央常委”的职务。在由行政三级降至七级后，又特别保留了四合院、小轿车、

司机、警卫、厨师、勤杂、秘书。国人社会地位的尊卑，往往集中展示于权力所给予物质待遇之厚薄上。父亲既受政治贬损，又得生活厚待。如此发落，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预想。

斗转星移，岁月悠悠。慢慢地，父母开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沉重和帽子底下沉重的人生。首先便是与中国历史同样源远流长的世态炎凉。亲近的、亲切的、亲密的，一个接一个地疏远、疏隔、疏离了。而且，越是亲近亲切亲密的，就越发地疏远疏隔疏离。诸如，20年代一起参加北伐战争的老友，30年代共同发起“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”的第三党人，40年代参与筹措成立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”的民盟元老。好像他们当初当年当时结识章伯钧，便是一种错误。惟有1957年的政治风雨，才拨正了他们所在党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。看着他们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样子，父亲也跟着替他们心痛。

一日，戴帽的母亲到农工党北京市委去参加政治学习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大老远便瞅见个老熟人。这也难怪，五十整的年纪，眼神正好。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书长，他不仅和父亲、母亲熟，而且和我姐、和我也熟。我家的门槛儿，他是跨进跨出的。每每在与父亲谈正事之前，他都要给我姐妹俩讲上一段故事。故事多半说的是燕都旧话，再与那满嘴的京腔京韵相搭配，我俩听得津津有味。民盟中央的人，从沈钧儒开始往下数，来家里开会、谈事、做客、聊天的，不下几十个。要论个生熟咸淡，眼下这位离母亲不远的人，得算在十名以内。所以，我很能想象母亲认出他时的那股冲动、那般欣喜及那份热情。

母亲挥动着手，向他飞奔过去。那位副秘书长停住脚步，四下里张望。当他那双近视加老花的眼睛透过厚重的镜片，终于辨清来者为何人的时候，即毫不犹豫地转身一百八十度，快速消失在人流中。

母亲傻站在街沿。她对老熟人或许有很多的话要说，或许只



图② 1937年，潘素摄于上海。



图⑤ 30年代，张伯驹在丛碧山房寓所。

想问声好。她有如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，回到家中眼泪便扑簌簌地滚落出来。在父亲的询问下，母亲讲述了街头刹那间的经历。

站立一旁的我，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；我为如此熟识的人能做出如此绝情的事而愤怒，心底还有一种母亲受辱自己也跟着受辱的感觉。

母亲为自己的不识时务、不通人情而悲哀，不禁叹道：“解放前看的《红楼梦》和解放后读的马克思，都算白费了。连熟识的人才专做绝情事的起码常识，都没能悟透。”

父亲则劝母亲心放宽些、看得开些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大到一个政党的背信弃义，小至某人的躲避奔逃，自古就是中国官场的传统。”不过，父亲也从中预见到自己的未来，必是孤独自处的末路。除非钦定的章罗联盟和反右运动被钦定者推翻，而这个“推翻”又是根本不可能的。

忧心忡忡的我问道：“爸，人当了右派，怎么别人就不理睬了？日子也难过了？”

问话使父亲激愤起来，他忿忿地说：“只有在中国当右派，才是这个样子。小愚（我的乳名），你哪里晓得——在西方，右派也是很体面的。议会里，还有他们的席位呢！与左派的区别仅仅是政见之不同罢了。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，左派、右派、中间派各自发表看法，陈述主张，申明立场。因为各派所持立场、主张、看法不同，它们之间势必要有激烈的辩论、争执以及相互攻击。这一切，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现象，并受法律保障。西方国家的官方政策，往往也都要经过这些辩论、争执和攻击的考验或矫正。现在，右派被定性为反党、反人民、反社会主义，还划了个资产阶级成份。那么，左派与右派便不属于思想差异，而成为革命与反动的政治对立了。在我们这个国度，谁一旦成了统治者的政治对头或被看做思想异端，日子就很难过了。国家、权力、舆论、党

派、社会、朋友，甚至家庭，都会纠合成为一股力量，不断地打击、迫害、除灭这个对头和异端……”

我自幼就爱听父亲说话。因为他说的，和报纸上登的、收音机放的、课堂里讲的，都不一样。他不从属于别人，他只属于自己。

或许因为情绪激动，父亲的声调越来越高。母亲不让父亲继续往下讲，打断他的话头：“当着孩子的面，不要说这些，而且一句一个共产党，一句一个老毛。从前你可以这样说话，现在你是右派，再不可以这样讲了。你在家里讲，万一传到外面，人家真要说章伯钧反动到家了。你也没有必要和过去一样傻，把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。”

我知道母亲“训”父亲，是因为母亲疼父亲。特别是在眼下，知他疼他的人没剩下几个。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，整天整天的批判大会，父亲就像吞大鱼大肉一样，全部咽下。而母亲这番雨丝风片般的“训”，对父亲来说，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碟清炒苦瓜。父亲听完“训”，一不反驳，二不申辩，三不坚持。自己一个人回到书房。我也紧跟着进去。当父亲坐在写字台前的皮转椅上，他的脸色分明阴沉了许多。俗话说：树怕剥皮，人怕伤心。我在想：社会上已经失去“面子”的父亲，是不是觉得在家庭里开始失去“面子”了。父亲失去的再多，哪怕父亲在外面的存在等于零，那他也是我的爸。我一声不吭，站立在父亲的身后。父亲也一声不吭，双手交叉于胸。他的外表是平静的，然而心里必定很难受。六十多个年头的人生，在心窝里一次次跌宕起伏。

父亲面对政治压力和应付社会环境的惟一选择，是独处，也只能独处。假如他是个埋头做学问的，面壁数十载，独处一辈子，也算不得什么难事。偏偏父亲从中国私塾读到柏林大学，也没能塌心做学问，而是起劲儿地搞政治。搞政治可不能清静，得参与，得活动，得闹腾。开会，讲演，结社，游行，拟指示，呼口号，写

文章，直至发动战争（可惜父亲的本质是书生，他搞的政治始终未能上升到拿枪杆子的高级阶段）。父亲以此为生活，以此为追求，以此为乐趣。如今这种生活、追求和乐趣，给概折掐断，戛然而止了。这番光景，好似一个有名气的演员，戏唱得正带劲儿的时候，被轰下了台。令其振作、陶醉和亢奋的锣鼓，丝竹，灯光，油彩，底班，龙套，跟包，观众，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现在一大早起床，父亲不必忙着漱洗用餐，既没有机关让他去上班，也没有单位请他去讲话。上午到下午，父亲不必忙着东奔西跑，既没有事情等候他处理，也没有会议需要他参加。从早到晚，父亲不必忙着前庭后院的穿梭，既没有人按动大门的电铃，客厅里也没有响动的电话，书房里更没有摆放好的文件、报告、公函、书信，亟待拆阅。父亲全天最重要的事，就是从洪秘书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——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……厚厚一叠，他的眼睛像架扫描仪，用不了多大功夫，就都“扫”完了。惟有每日分两版的16开大小的《参考资料》，读得仔细，看的时间也最长。

父亲说：“只有‘参考’上，还有一点消息。”有时候《参考资料》送进门，正巧父亲要去方便。他能拿着它，在卫生间里呆上几十分钟。要不是母亲催我也叫唤的话，不知他坐在马桶上还得看多久。老实讲，能得到这一点消息，也来之不易。因为父亲在必须接受右派帽子时，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惟一请求，就是希望今后能够继续看到一份《参考资料》。

把看“参考”的事做毕，父亲也就终日无事可做了。在以往杂乱忙碌辛苦劳累疲惫困乏的时候，他多么向往安宁清静恬淡闲适的日子。现在，他向往的日子来了，却没能给自己带来安宁清静恬淡闲适。五七年以前，那时事情再多、工作再忙，父亲每隔一两个月总要抽出一天的工夫，把全家带到郊外去散心。香山、颐和园、十三陵是常去之地。现在，每天都可以去郊游，父亲却呆

在家里，不爱动弹。说来也是，父亲乃职业政治活动家，现在打发他去过既无政治、又无活动的生活，他浑身上下能得劲儿吗？父亲常一个人独坐书房。黄昏时分，书房内一片幽暗，他也不开灯，凄败之色在脸上尽情地铺展，犹如把自己自觉地放逐在大漠之上，而四顾茫然……

年轻的我很难体会出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，但我发现自己的日子过得也不痛快了。填好的入团申请书，被告知作废。政治课老师拿我的思想小结或学习心得作为批判材料，在全班散发抖落。班干部和积极分子都不怎么搭理我。干部子女身份的同学把我从圈内踢到圈外；出身不好的同学又不敢把我从圈外划入圈内。一个先是团支部书记后当上学生会主席的同学，时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，并抓紧一切可以抓紧的机会，随时向我发动攻击。站在学生官儿的位子上，她的每次行动又总能纠集到同伙。一旦我陷入挨批的处境，就觉得自己也当上了爸。这时我心里也着实纳闷儿：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，只要怀上一颗革命的心，怎就穷凶极恶起来？下午自习课后的自由活动，是我最难挨的时光。看着同学三三两两地闲聊天，拉帮结伙地搞活动，就好像一支行进中的浩荡队伍单把我抛撇在外头。我孤零零地伫立于操场东头的老杨树下，看着渐褪的夕阳，即使什么都不想，只要鼻子一酸，那眼泪就流成了行。为了排遣空虚，我能借个篮球，一口气玩它几个小时。

我的同学、已是北京青少年业余体校篮球队员的洪铃，瞧我投篮的兴致如此之高，便对我说：“你那么爱好体育，找个机会我推荐你去业余体校学打篮球吧？”

我回家把这事儿跟父亲说了。父亲这下子可找到一个分析事理的机会。他口若悬河地讲起来，认为洪铃的通脱，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响。然后，告诉我戏剧家洪深出身官宦门第，且毕业于哈佛。再后，又向我讲述了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一案，而



图④ 1950年，张伯驹与女婿楼宇栋在北京西效承泽园寓所。

如何改变了儿子的人生道路。最后，父亲建议我去看看曾朴的《孽海花》，说那里面影射了许多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，很有意思。由此，我发现讲些自己的事，居然能引起父亲的话头。他，真的寂寞。

时间一长，我打球的热情开始消衰，决定不再去体校。下午放学回家，把功课做完，就和父亲一样地无事可做。东翻翻，西看看，从北客厅溜到南书房，又从东客厅逛到西卧室；再不，打开收音机，从孙敬修娓娓道来的童话故事，一直听到那时正流行的歌曲《社会主义好》。

无事可做的父亲看不惯无事可做的女儿。他问：“你的心上是不是长了草？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？”

人可真是个复杂的东西，像父亲仅在1957年一个夏季，就能给官方提那么多条的批评意见；而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，除了以疑问句方式批评我“心上长草”之外，至今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父亲是否还教训过我什么。

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做成一件事，我向父亲郑重提出要学书画。理由是：“如果我不学的话，将来你死了，你买的那么多的字画由谁来欣赏呢？”父亲听后，大惊大笑亦大喜。精神之振奋，情绪之昂扬，活像当天我要给他做大寿。

父亲立即张罗起来。首先让母亲把她的西书房腾给我，然后给我送来文房四宝、镇尺印泥、碑帖、画谱。他自己充当搬运工，不叫洪秘书插手。什么康熙时期造的墨，给乾隆爷进贡的纸，紫檀的笔架，端溪的砚台，还有祝允明、文徵明、吴昌硕、金农、郑板桥、吴大澂、康有为等人，以及我当时就认不得、现在也记不起来的许多名家写的立轴、手卷、册页。父亲每搬来一样宝贝，都要数落给我听，抖落给我看。

见他两手灰尘一脸汗，我心疼得叫：“爸，别搬了。”他却乐此不疲，止都止不住。

母亲被父女俩昂扬的热情所感染，也陪着我们高兴。可一旦

目如朗星”，是评书里形容男性的惯用词语。我觉得把这个惯用词语套在他身上，“银盆”略有些过分，而“朗星”却很是很得当的。

沙发前面的茶几上，摆着用玻璃杯沏好的两杯热茶，这显然是给我们的。望着杯子里尖细的茶叶载沉载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绿染浓，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杯水之间，能呈现如此的清幽和美丽。它的诱惑，简直有如饿汉面对着一道美食。实在忍不住，自己先就喝开了，一口、两口、三口，直至喝干，然后兴奋得对父亲叫嚷道：“爸，我喝的这是什么茶呀！会这么香？”

陈半丁说：“这茶叫洞庭碧螺春，是我特意给你们预备好的。”

父亲见我如此牛饮，便道：“陈半老，请莫见笑哇！我不懂茶，更不知品茶为何事，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红茶罢了。”

父亲细细啜饮，对茶味的醇和与茶香的绵长，赞不绝口：“这里的茶，让我想起‘佳茗似佳人’的诗句和因吃茶把家产吃空的故事了。”

从这话里，我能感受到父亲因获得碧螺春规格的礼遇而产生的快慰。父亲曾说过：如到别家做客，从外国人给你预备的杯盘刀叉和从中国人为你冲泡的茶水里，大半能判别出这家主人对你欢迎和尊重的程度。

父亲问陈半老最近在做些什么，陈答：“我在大跃进。”

父亲困惑不解：“画家怎么大跃进？”

“画家的大跃进，就是把画越画越大。”陈半老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指着自己的画桌说：“这张桌子够大了吧？不行，不够大，要画更大张的，我就挪到地上画。后来，这样画也不行了，要求画更大更大张的，我就搬到院子里画。”

讲到此，他把我们父女带至客厅门口，让我们目测这所四合院的庭院横有多宽，竖有多长。父亲听得直摇头。

陈半老说：“因为大跃进的缘故，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院子的尺寸。跃进到最后，院子有多大，我的画就有多大了。”



图⑤ 1956年7月，为表彰张伯驹、潘素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等八件珍贵法书捐献国家，文化部特颁褒奖状。

在我写字、母批字、父看字的工夫，我们忘记了各自的不幸和共同的寂寞，一起感受着快乐。尤其对于父亲来说，无论是给我布置画室，还是看我练字，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丰草，润泽着他的心田。

谁来教我画画儿呢？父亲决定给我找最好的国画老师：“你看，陈半丁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当然好啦，只怕太高，我够不着。”

父亲笑了，说我傻。因为投师皆投于高门之下。

父亲把洪秘书叫来，让他与陈半丁联系，问问：这个星期天陈半老是否住在西四？上午可有空暇？章某人想带着他的女儿登门拜访。不一会儿，就有了回话儿，说半丁老人非常欢迎章先生和女公子。

听到这“非常欢迎”四个字，父亲实在舒心。

我问：“咱们去之前，干嘛要打听清楚陈半老住不住在西四？”

父亲答：“他有两个家。”

我后来才弄懂父亲说的“两个家”，是个啥意思。

陈宅，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。陈半丁，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老头，面部所有的线条都流畅圆润，眼睛炯炯有神。“面如银盆，

发现父亲有时亮出的宝贝是她压根儿没见过的，便有些愤愤然，对父亲说：“你这个老头子！居然藏了这么多好墨好纸。我给你抄了多少稿子，替你写了多少书信，你都不把好纸好墨给我，现在小女儿只说了一声要学书画，八字还没见一撇，你就把好东西都摆出来了。”

母亲说这话，最初只是嗔怪，后来她还真的怏了点子气。父亲赶紧陪笑。

继而，是关于请谁来当我老师的问题。

父亲说：“教你写字的人不用请，你妈就是最好的老师。”

母亲的书法特棒，这是党派圈内众人皆知的事。抗战时期“民盟”给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，就是母亲用正楷誊写的。她正经八百一手颜体楷书，连周恩来都知道。50年代初国家决定在天安门前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，母亲接到被聘为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的通知。她大惑不解：自己不是建筑家，又非美术家，怎地成了委员？后来遇见周恩来，周说是他提名的，说：李健生懂书法，对碑文的设计可以出些力。

母亲从如何握笔提腕运气开始教我练字，让我从篆隶练起。挑了一本邓石如的《石鼓文》册页，叫我天天临摹、反复书写。说什么时候练熟了，写得像个样子，才能歇手。我爱练字，更爱父亲给我布置的书房和他给我的每一枝笔、每一张纸、每一块墨。每天做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前，先练字。母亲不怎么看我写，写完后她用朱笔批阅。整个字都写得好，在这个字上勾个大圈圈；字的某个局部写得不错，就在这个局部画上小圈圈。一张大字经母亲的批阅，变得像人工绘制的地图。

父亲则是个持久的看客，我只要展纸提笔，他便在我身后走走停停、停停看看。管我写得好歹，父亲是一概欣赏。他在不停地夸奖我的同时，还不断地自责，说从小没有把字练好，现在眼瞅着女儿超过了自己。其实他的自责，仍旧是对我的欣赏与疼爱。

爸又困惑不解了：“这样大的画，该如何画呢？”

陈答：“脱了鞋，站在纸上、蹲在纸上或趴在纸上画。西南角画它一棵松，东北角涂它一架藤，松枝旁边添石头，藤蔓底下开菊花……至于这幅画的全貌，我也难知。因为画完以后，我家无法张挂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悬挂这样的画。”

一阵闲谈后，父亲将女儿想学画的事说了。

陈半老一口答应收我为徒。父亲向陈半老请教，画坛收徒有何规矩及礼仪。陈半老说：“你家是下午喝红茶的洋派，那些规矩就免了。”

我问陈半老，今后是怎样个教法？答曰：“画好一张或数张，拿来我看。”

在归途，兴致不减的父亲还带我到西单商场的旧书店逛了一圈。回家见到母亲，我还没来得及说个子丑寅卯，他老人家便抢先一步“报导”。我很知道父亲足足高兴了一天的原因是什么——陈半丁没把他当右派。

父亲自己也看出来，要陈半老一枝一叶、一山一石地教我这个一窍不通的学生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他决定重新物色个更加适合于我的老师。这时，父亲想到女画家潘素。

我问：“谁是潘素？”

“张伯驹夫人。”

“谁是张伯驹？”

父亲说：“此人大有名气。他的父亲张镇芳，曾当过直隶总督和河南都督。他本人入过军界，搞过金融，最后扬名在诗词文物。你看的旧小说里，形容才子不是常用‘诗词歌赋，无所不晓，琴棋书画，无所不通’吗？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。他与张学良、溥侗、袁克文一起，被人称为‘民国四公子’。家中的收藏，多为罕见之物，那是他用大洋、金条、首饰乃至房产换来的。别看爸爸有字画五千多件，即使都卖掉，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。”